

趙起《种太尉傳》所見的 六逋宗之役(公元1077年)*

曾瑞龍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對研究戰爭史的學者來說，一次軍事行動的成敗可以從象徵和理念的層次去了解，也可以從戰役運作的層次去了解。弄清楚這兩個層次的分野是非常必要的。這樣說並非由於我們力持軍事專業主義(military professionalism)的成見，排斥一切與軍事行動有關的象徵和理念因子，而只追求軍事業務本身的目標。相反，作為歷史學者，有需要承認軍事行動的直接後果，和人們對這種後果如何詮釋，同樣屬於歷史範圍內的事情。只看到戰爭如何滿足文化的象徵主義和身分認同，而不能從實際運作的層面去詮釋；又或太強調戰役取向(operational preference)的重要性，而未能恰當評估規範(norm)和意識形態對武力的維制(restraint)，都有以偏概全之弊。¹弄清楚這兩個層次的分野，能令人看到歷史上有不知多少次，在勝利女神的象徵標誌下是如何不徹底的軍事征服；同時也令人看到，一次軍事勝利在人的觀念中是怎樣地被消化吸收，亦決非一成不變的事情。如果戰勝攻取與國家和軍隊的組織文化存在難以調和的衝突，這種勝利便帶來較大的爭議性。²總之，軍事行動的成果，在象徵/理念的層次和戰役運作的層次往往有一段距離，而這段距離，是歷史學者在研究與戰

* 本論文初稿曾於臺灣大學歷史系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辦之「轉變與定型：宋代社會文化史學術研討會」上宣讀，在會議上得到評論員李天鳴的精要評述，又得聆梁庚堯、王瑞來、湯開建、江天健、方震華、龍沛(Peter Lorge)等學者的寶貴意見，令這篇文章增色不少，謹此致謝。

¹ 前者的代表可舉 Jonathan R. Adelman and Shih Chih-yu, *Symbolic War: The Chinese Use of Force, 1840-1980*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ROC, 1993)；後者近年有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一書較能從理論層次去剖析。

² Jeffrey Legro, *Cooperation under Fire: Anglo-German Restraint during World War II*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作了理論回顧和討論，並提供了某些二次大戰的實例。

爭相關的課題時所需要預計到的。本文將要論及的熙河拓邊後段所發生的六逋宗之役(1077)，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

按宋代官方的說法，熙河之役以熙寧六年(1073)十月王韶(1030-1081)取洮、岷一戰結束，共得地二千餘里，宋神宗(1048-1085，1067-1085在位)解所佩金帶賜王安石(1021-1086)，作為勝利的標誌。³無疑，這是王韶個人事業的頂峰，甚至也可以說是王安石一生最光輝的時刻之一。的確，王韶的邊功是劃時代的，但從熙河拓邊的全部過程來看，他只是開拓者，還遠遠不是一個收成者。事實上熙河之役的軍事行動並未結束，熙寧六年也不是這個地區走向穩定的標記。在六逋宗之役以前，宋人還未能有效地控制熙河路的南部，岷州一再呈現不穩，而洮州一帶大概還未建立有力統治。王韶初期的主要成就，是鞏固了秦州古渭寨向西的突出部，並隨著俞龍珂(1071年後改漢名包順)的降附，擴大到岷州；然後北上築渭源堡、乞神平，進據洮河上的武勝，建為熙州。可是王韶向河州方向的攻略，就遇到很大反覆，河州得而復失，幾經爭奪才勉強立住腳跟。王韶為了穩定河州的局面，三度向洮河上游進行釜底抽薪的掃蕩作戰，但從未真正控制該地區，吐蕃首領青宜結鬼章(1017前-1091)和冷雞朴(?-1077)仍在頻密活動。潛在的危險更來自北邊，西夏在蘭州外圍的西市城、汝遮谷都駐有重兵，威脅著王韶的補給線。換言之，南北兩翼都不安全。這個問題的開始解決要到李憲(死於1092)的任內。熙寧九年(1076)，宋廷起用种諤(1026-1083)知岷州，在鐵城之戰擊敗了青宜結鬼章。熙寧十年(1077)，李憲轉守為攻，發動六逋宗之役，才真正殲滅了冷雞朴的勢力。從此一直到元祐二年(1087)，洮南一帶不再有劇烈的軍事對抗。1087年鬼章就擒以後，宋人便真正控制了洮、岷地區。至於北翼安全問題的舒緩，要到元豐靈夏之役(1081)，李憲取汝遮谷、西市城和蘭、會二州，西夏對熙河的軍事威脅才為之稍減。紹聖(1095-1098)以後，宋軍進築葫蘆河川和天都山，西夏的中央戰線受到威脅，在側翼戰場的影響力便大為消退，宋人在熙河的統治才達成真正的穩固。總之，王韶時代的熙河路仍然好像從秦州—古渭—熙州—河州的一條線，到李憲的手上才真正成為一個面，而六逋宗之役是這項轉變的其中一個關鍵。可是傳統以來，李憲的戰功不像王韶那般受到重視，這和李憲身為宦官的屬性有關，但也不可忽略其手下戰功特高的种諤，也是一個極富爭論性的人物，及六逋宗這個會戰地點並非一個政治中心，未能有效地提供一種象徵意義上的勝利標誌等要素。

關於六逋宗之役，傳統史料是有記載的，但非常零碎和模糊。《宋史》和《東都事略》的〈种世衡傳附种諤傳〉，以及《宋史·李憲傳》都有相當簡略的記載；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對作戰經過的描述也是非常簡略，大致上和《宋史·李

³ 李燾(1115-1184)：《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以下簡稱《長編》)，卷二四七，頁6022-23。

憲傳》來自同一個來源。不過《長編》的好處是附有這一役後諸將遷官的詳盡紀錄，對弄清楚戰情發展有不少作用。此外，《東都事略·姚麟傳》和《宋史·李浩傳》對戰情有片段描述，可是卻沒有引起史家的充分注意。近人對唃廝囉王朝及北宋熙河開邊的考證，以祝啟源《唃廝囉——宋代藏族政權》一書論述最為豐贍，然而也沒有論及這一役的重要性。以青唐唃氏為專研範圍，特別是曾撰專文討論鬼章軍事活動的鈴木隆一氏，在該文也只討論了种諤的鐵城之役(1076年)，而沒有注意到規模更大的六逋宗之役。⁴筆者並非吐蕃史專家，對這個問題的興趣，在於從种氏將門的研究旁涉而生。⁵寫這篇稿子本來只是基於一個單純動機，想弄清楚鐵城之役後的种諤為甚麼忽然從引進副使一下子擢昇為東上閣門使？當時認為這一定有相當可觀的戰功才行。慢慢地搜集了一些零碎史料，最後令我獲得較大進展的，是看到了宋人趙起《种太尉傳》一書，裏面有大段關於六逋宗戰役的描述。根據這本較少被引用的著作，輔以其他史料，以下嘗試勾劃出六逋宗之役的大致輪廓。當然，由於筆者並非研究唃廝囉王朝的專家，內文一定有很多錯漏，需要專家的意見來糾正。

關於趙起《种太尉傳》

北宋後期的名將种諤，一生銳於拓邊，四次策動向西夏的戰爭，兩次贏得對吐蕃的主要戰役，是宋神宗一朝拓邊活動的主角。不論對他的評價是好是壞，當時「种諤不死，邊事未已」的蓋棺定論，反映出他在對外戰爭中的重要角色。像王安石及其主要助手一樣，种諤在熙豐新政期間表現活躍，勇於立事，因而受到舊黨大事抨擊，正史也記載了他一生行事的不少污點，其中可能包含惡意中傷，使我們對這位歷史人物進行客觀評價時遇到一定困難。

筆者開始留意种諤的生平事蹟，是在1982–1984年撰寫以种氏將門為題的碩士論文的時候。當時所根據的主要史料是《宋史》和《東都事略》的〈种世衡傳附种諤傳〉，

⁴ 參祝啟源：《唃廝囉——宋代藏族政權》(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有關章節，頁92–116。鈴木隆一：〈青唐大酋青宜結鬼章と熙河〉，原刊於《安田學園研究紀要》卷二七，頁36–42；收入《中國關係論說資料》卷29(1987年)，第三分冊上，頁182–85。此外陳守忠：〈王安石變法與熙河之役〉，原刊於《甘肅師大學報》1980年第3期，頁3–14；收入陳守忠：《河隴史地考述》(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113–27，亦未提及此役。廖隆盛：〈北宋對吐蕃的政策〉，原刊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四期(1976年)；收入國立編譯館(編)：《宋史研究集》第十輯(臺北：國立編譯館，1978年)，頁93–144，提及斬冷雞朴一事，但敘事上與熙寧九年底的鐵城之戰未加分別。

⁵ 構成本文寫作的背景是筆者1984年所撰的碩士論文：〈北宋种氏將門之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未發表，1984年)。當時由於《种太尉傳》一書尚無緣寓目，對六逋宗之役並未加以留意。

加上《長編》、《宋會要》和《涑水記聞》等書中的有關記載。筆者在一年前在劉琳、沈治宏所編《現存宋人著述總錄》中得悉北京圖書館藏有趙起《种太尉傳》明鈔本，後來更發現此書已收入《四庫全書目叢書》面世。⁶北京圖書館藏本全一卷，共七頁，每頁左右十四行，每行上下二十一字，首頁上方殘缺，內文部分單字略有斷爛，可能是宋版摹抄本。臺北中華民國國家圖書館藏《穴硯齋史鈔》所輯《宋武臣傳》有另一抄本，共八頁，每頁左右十二行，每行上下亦二十一字，全卷完整。

《种太尉傳》最耐人尋味的是其作者。种諤死後，已有范育(?-1085後)替他撰寫墓誌。范育之父范祥(亦名范翔，十一世紀中葉人)是北宋開邊政策的老祖，曾在秦州進築古渭寨，後來王韶在此基礎上擴大邊面，建為熙河路。范育是种諤的得力助手，後來擔任熙河路帥之後，又讓死去的老上司的弟弟种誼(?-1087後)、兒子种朴(?-1099)來當將佐，與种諤的關係非比尋常。然而趙起是何許人？和种諤的關係如何？撰寫《种太尉傳》目的何在？目前找到的記載非常有限。作者署名「河汾散人趙起得君撰」，《宋史》無趙起傳，四庫館臣的案語說「河汾地廣，不知其里貫何所也」，⁷顯然表現出他們對作者的生平難以根究。

筆者目前所掌握的資料顯示，宋代有兩位趙起。第一位是《宋元學案補遺》引《劉後村集》所記趙綱的父親，是尤溪人氏，號石門居士。⁸從籍貫與字號來看，與《种太尉傳》的作者有較大距離，不大像同一個人。另一個趙起見於《宋會要》，是兩宋之際牛皋的部下。紹興三年(1133)牛皋和彭玘率部自偽齊歸宋，襄陽鎮撫使李橫奏請將二將麾下將佐授予原來官職，其中趙起在諸將中居首，是武經大夫、達州刺史、知信陽軍。⁹這個趙起的籍貫和字號不詳，也沒有辦法證明他是《种太尉傳》的作者。不過如果從兩個可能人選中比較，牛皋的部下趙起來自京西，與《种太尉傳》的作者自稱「河汾散人」這條線索略為接近一些。同時，他本身是軍官，與書中具體地描述戰鬥序列和戰術動作的視角也比較配合一點。當然，上述推測並不排除尤溪學者趙起從某種途徑得悉种諤生平，又或兩個都不是《种太尉傳》作者的可能性。

趙起其人身分曖昧不明，書是宋人所作則不成問題。這本書《宋史·藝文志》有著錄，說「《种諤傳》一卷，趙起撰」。¹⁰李燾注中兩度引用這本書，也是寫作趙起《种

⁶ 暨南大學湯開建教授曾影印寄來《种太尉傳》北圖本一份，謹此致謝。

⁷ 清永瑆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年)，卷十三〈史部傳記類存目〉，頁13。

⁸ 清王梓材(輯)：《宋元學案補遺》，收入王德毅(編)：《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第249冊，卷四九，頁710。

⁹ 徐松(1781-1848)(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以下簡稱《宋會要》)，兵十五之二，頁7017下。

¹⁰ 脫脫(1313-1355)：《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二百三〈藝文二〉，頁5122。

諤傳》，說明這本書成書年代在《長編》之前。書中對宋神宗的稱呼，多處稱「上」，一處稱神宗廟號，¹¹說明書成於神宗去世之後。由於這本書並沒有收進《四庫》，只有存目，內文中宋代對邊疆民族某些帶貶義的稱呼仍舊未遭篡改，如稱西夏為虜、酋、賊、偽、敵、羌、夏羌、夏兵，夏人；吐蕃為戎、酋、敵等，不一而足。¹²書中對兩位宋將王君萬、楊萬的姓名均寫作王君曼、楊曼，但在「官軍二萬人」、「斬首一萬級」、「白金一萬兩」和「賊十數萬」的場合都仍作「萬」字，未知何故。¹³

至於書名，卷末作者已自稱「故慨然次其行事，作《种諤傳》云」，《長編》、《宋史》也都作《种諤傳》，因此《种諤傳》才是這本書的原來標題。四庫館臣對書名有如下的說明：

其書專記龍驤四衛指揮使知延州种諤事蹟。……末云次其行事，作《种諤傳》，而此本前題《种太尉傳》。考：史不言諤官太尉，此傳亦無此文。蓋自唐以後，武臣顯貴者往往加至太尉，遂習為尊稱，不必實居是職。如李煜歸宋後，祇為特進隴西郡公，而徐鉉奉詔往謁，乃語闡者，稱願見太尉。蓋當時流俗，有此等稱謂。意其猶宋人舊題也。

四庫館臣從太尉是宋代對武臣的尊稱，而判斷這書名是宋人舊題，基本上是可以同意的。可是館臣沒有注意到它在《宋史·藝文志》已有著錄，而書名是《种諤傳》。目前這個叫《种太尉傳》的，似是當時流傳的某一個鈔本的名稱，而不是它比較正式的書名。

那麼《种諤傳》是否就是《种太尉傳》呢？從我們僅有的史料看來，初步可以看成同一本著作。現存《种太尉傳》鈔本的末尾就已提到書名其實叫《种諤傳》，不但作者、卷數和《長編》、《宋史》所載的《种諤傳》完全相同，就是《長編》注中所引用的兩處來看內容也一致。¹⁴

由以上討論可以初步指出，《种太尉傳》是宋人趙起所作，原名《种諤傳》，曾為《長編》所引用，《宋史·藝文志》也作了著錄。從書中提及神宗的廟號來看，估計著作的上限是哲宗一朝(1086-1110)，而下限是《長編》神、哲二朝部分的成書年代，大

¹¹ 趙起：《种太尉傳》，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全一卷；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第81冊，頁6b。

¹² 同上注，頁1b，4b，5b(兩次)，6a；2a(兩處)，2b；2b，4b，5a；5a(兩次)；1b，2a；2a，2b，4a，4b，5a(兩次)，5b，6b(四次)；2b；1b；3b，6a；3a；3b；3b。

¹³ 同上注，頁2b，3b，4a。

¹⁴ 《長編》卷三二〇，頁7730注：「趙起作《种太尉傳》云：『諤以十一月十三日至白池，準詔班師。』當考。」又卷三二九，頁7923關於种諤受徐勳連累降官一事，分別見《种太尉傳》頁5b及6b。

概是淳熙元年(1174)左右。¹⁵作者生平及與种諤的關係均不詳。如上文指出，在南宋紹興三年牛皋、彭玘手下的部將趙起，和尤溪學者趙起兩個人選其中，前者的機會略高一線，但也有可能兩個都不是。從書中對种諤的幾次戰役經過都有詳盡披露看來，作者可能是接近种諤的指揮核心的人物。

《宋史·种諤傳》對种諤的邊功是持比較負面態度的，其中對他種種不利的評論，諸如「自熙寧首開綏州，後再舉西征，皆其兆謀，卒致永樂之禍。議者謂諤不死，邊事不已」。¹⁶四庫館臣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承襲了這類見解，因此說：「史稱諤雖名將，而喜事貪功，實開永樂之釁。今傳中無貶詞，殆亦不無溢美矣。」很可能這就是《种太尉傳》沒能被收進《四庫全書》的原因。同時應該指出的是，四庫館臣似乎只是偏信正史，對种諤的生平沒有作過細緻的研究，連种諤的官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也誤作「龍驤四衛指揮使」，顯示了館臣對北宋禁軍四廂都指揮使的官名欠缺認識。

四庫館臣覺得傳中沒有貶詞是一種闕失，因此沒有將它收入《四庫全書》。從嚴謹的史學立場而言這是很正確的，但從保存史料的角度而言，卻是可惜的事情。從內容看，它不是《宋史》和《東都事略》中《种諤傳》的同源史料。據筆者目前的認識，《宋史》和《東都事略》的《种諤傳》是按照范育所撰的《种諤墓誌》為主要藍本，而加以近乎舊黨立場的一些評論而成。范育所撰的种諤墓誌今已不存，但從《長編》所引用的段落中，仍可窺見其大概；而趙起《种太尉傳》在文字和記載方面，都沒有沿襲這些作品的明顯痕跡。其次，它描述補充了种諤生平近乎空白的一些環節，如六逋宗之役(1077年)，《宋史》的記載就極其零碎；《种太尉傳》也有一些片段與《宋史》和《東都事略》中《种諤傳》可以互相補充，如取綏州(1067年)、拔米脂(1081年)兩次作戰，都涉及一些《長編》、《宋會要》和《宋史》所沒有記載的細節，有一定史料價值。以下章節以《种太尉傳》為核心，佐以各家史料，論述六逋宗戰役的經過和重要性。

六逋宗戰役的醞釀

王韶收熙、河，「逐處蕃部，各懷震怖」。¹⁷唃廝囉的繼承者董氈(1032-1083)感受到威脅，便以大首領青宜結鬼章和冷雞朴經略洮西，以復故疆。自熙寧七年(1074)至十年，青宜結鬼章和冷雞朴是宋軍在洮西的大敵。熙寧七年踏白城之戰，宋將景思立(1074卒)、王寧(1074卒)戰死，鬼章函二將首級自隨，經常出示西域諸國的使

¹⁵ 裴汝誠、許沛藻：《續資治通鑑長編考略》(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24-26。

¹⁶ 《宋史》卷三三五《种世衡傳附子諤傳》，頁10748。

¹⁷ 《長編》卷二四七，頁6032。某些記載顯示宋朝官員受到吐蕃人民的歡迎，可能反映不同地區的狀況，見《長編》卷二四一，頁5886。

節。熙寧八年八月，朝廷一度以邊事平息，下令熙河路及洮西安撫司由每十天報平安改為每月一次。¹⁸十二月，河州木宗城首領投宗哥，被定羌城熟戶斬首來獻。¹⁹熙寧九年一月，鬼章令首領結氈攻河州，不料結氈與其甥斯巴溫同謀殺鬼章，鬼章走塔南城。²⁰二月開始，軍事行動重新逐漸昇級，鬼章取道棟棟谷，入五牟谷，蕃官蘭氈納支加以邀擊，斬四百七十級。同時，董氈以旗號、蕃字至洮、疊二州誘「順漢蕃部」，引發與洮東安撫司的小規模武裝衝突。²¹三月，鬼章再進至五牟谷，被熙河鈐轄韓存寶(1081卒)所敗。宋廷隨即起用种諤知岷州。²²五月，冷雞朴圍河州郭莽寺，被寺僧和蕃部拒退。²³隨著熙河路南部形勢愈趨緊張，王安石與王韶之間發生歧見。王韶主「省靜」，不想過分追究諸將違法的事件，王安石則不以為然。²⁴六月，宋人探報西夏起兵十二萬來取熙河，王安石當即表示懷疑，說夏國每次進攻「罕能及二十日」，即使探報屬實，也無須過慮。²⁵結果西夏並沒有發動這種規模的進攻，但這份情報也代表熙河路局勢不穩，指揮層杯弓蛇影的心態。十一月，鬼章逼近岷州。蕃官包順先打了一場前哨戰，斬首二百六十餘級。²⁶稍後，洮東安撫司報稱「鬼章領兵入斯納家地，未知營寨所在」。宋神宗大為緊張，立即詔「昭宣使、入內押班李憲乘驛計議秦鳳、熙河路經略司措置邊事」。次日，下詔補充說明李憲的權力：「憲至，軍前一應將官等，並聽憲指揮。」²⁷李憲一掌握完全的指揮權，熙河路經略安撫使張洸便實際上被架空了。一如御史中丞鄧潤甫、御史周尹、蔡承禧和彭汝礪之言，「中外之論，皆謂憲雖名為計議措置邊事，而軍前諸將皆受憲節制，其實大帥」。²⁸

可是李憲還沒有到任，宋洮東安撫司在知岷州种諤的指揮下，迅速而果斷地平定了內部蕃情的不穩，繼而又取得鐵城之戰的勝利。《長編》寫出种諤先揭發了一起吐蕃人的襲擊事件：「先是，鬼章聚兵令丁谷脅屬羌瓜家族以叛，諸部皆動搖。……戮瓜家族叛黨二百餘人，諸部乃定。」關於這件事的始末，《种太尉傳》有較詳盡的說明：「冬十月，董氈將鬼章聚兵冷丁谷，脅誘瓜家族。公計之，曰：『彼必有外來為

¹⁸ 《長編》卷二六七，頁6552。

¹⁹ 同上注，卷二七一，頁6653；《宋史》卷十五〈神宗紀二〉，頁289。

²⁰ 《長編》卷二七二，頁6658；《宋會要》蕃夷六，頁7824上。

²¹ 《長編》卷二七三，頁6676，6687。

²² 同上注，頁6695；《宋史》卷十五〈神宗紀二〉，頁290。

²³ 《長編》卷二七五，頁6726。

²⁴ 同上注，頁6730。

²⁵ 同上注，卷二七六，頁6740。

²⁶ 同上注，卷二七九，頁6827。

²⁷ 同上注，頁6835。

²⁸ 同上注，頁6839。

亂者。』因授糧，曰：『索於鞠場中。』果有裹甲懷兵而入者，得二百人，悉斬以徇。奪其馬械，賞戰士，諸部畏若神明，不敢復貳。」²⁹

緊接而來的是鐵城之戰，《宋史·神宗紀》載：「十一月，……壬午，鬼章寇岷州，知州种諤等敗之鐵城。……二月，……戊子，以鬼章敗，种諤等賞官有差。」《宋史·种諤傳》也記載：「復禮賓副使、知岷州。董氈將鬼章聚兵于洮、岷，新羌多叛，諤討襲誅之。」敘事都比較簡略。《長編》記載「洮東安撫司言，鬼章結連南北諸羌人寇岷州城寨，占據鐵城，誘脅青唐等族，日夕搖動，已有附賊」。³⁰ 岷州形勢之危急可見一斑。《長編》又載：

熙河路經略司奏：「……崇儀副使、知岷州种諤與東頭供奉官、走馬承受康識計議，十一月辛巳帥兵赴和爾川寨，翌日至鐵城，遇賊，斬首八百八十二級，及殺宗哥首領等。本司勘會鬼章引宗哥之兵，驅脅熟羌，深入寇邊，賴包順、馬忠密請出兵，諤、識能用其言，將佐協力，迎擊取勝。」詔諤遷引進副使，識改一官，與閤門祗候；皇城使包順、馬忠並遷遙郡刺史，順康州，忠達州，各與兩子恩；崇儀副使趙紹忠為內藏庫副使，趙醇忠為六宅副使，文思副使魏慶為左藏庫副使，西京左藏副使包誠為供備庫使。餘遷官、減年有差。識，河南人也。³¹

據此，种諤採納了蕃官包順和馬忠的情報，與走馬承受康識計議，然後發動進攻，但所謂計議的內容沒有說明。值得注意的是，這段記載來自熙河路經略司的奏報，而非來自李憲，很可能當時李憲尚未抵達，或其指揮部未正式運作。當時局勢嚴峻，种諤勢不容緩地出兵，《長編》又載：

壬午，知岷州种諤破鬼章於鐵城，斬首八百餘級（此據明年二月七日奏，今年十一月二十日事。……），諤出輕兵掩賊不備擊敗之。……鬼章又以兵三萬據鐵城，收貝斯結、羅斯結族以臨青唐。諤知羌素持貳，觀勝負以為去就，乃盡出兵二千，未明抵鐵城。賊不意漢兵至，驚擾莫知所為。縱兵擊之，鼓譟乘城，賊眾大潰，斬首八百餘級，鬼章乃遠去。岷境屬羌，不敢復貳（此據范育墓銘）。³²

²⁹ 同上注，卷二七九，頁6827；《种太尉傳》，頁3a。

³⁰ 《宋史》卷十五〈神宗紀〉，頁290-92；卷三百三十五〈种世衡傳附子諤傳〉，頁10746；《長編》卷二八〇，頁6861。

³¹ 同上注。

³² 同上注，卷二七九，頁6827。

這裏看出，种諤的計謀是攻其無備，成功的一個因素是夜襲，「未明抵鐵城」一句說明了這種情況。可是鬼章既已逼近岷州外圍，何以容許部下這般不明斥堠，仍然有一點不甚明朗。看了《种太尉傳》，這個疑團就可以得到解釋。關於鐵城之戰，趙起作了如下記載：

十二月，鬼章盜寇鐵城，降戎弊廝〔逋〕、祿廝結族皆應之，欲東南搖青唐。公陰將掩之。會走馬〔承〕受康識撫問迴，乃行送十數里，至精精堂，猶發餘兵還岷，示無出掠意。乘夜，以銳卒二千趣鐵城，鬼章重兵在西谷中，公先命驍騎斷其後。始明，薄城會戰，公躡從者肩，登其東南隅，揮劍大呼，僚吏蟻附，遂破之。斬首八百級，取大首領廝鐸彎，鬼章遁去。以功遷引進副使。³³

至於作戰的時間，《宋史》本紀作十一月，《种太尉傳》作十二月，似乎《宋史》較為正確。鬼章由冷丁谷挺進至鐵城，是這條史料最關鍵之處。冷丁谷又名冷地峪，清《洮州廳志》云在洮州以「東五十里與岷州分界處」。³⁴至於鐵城堡，宋人記載在岷州以東八十里，³⁵鬼章據鐵城，已構成互相楔入的狀況，切斷對方退路是必要措施，故這一役的關鍵不在於「驍騎斷其後」，而制勝關鍵在於發起攻擊的時機。據以上史料，种諤贏得這一役，是運用了兵法上「用而示之不用」的謀略。如上所述，鐵城在岷州以東，种諤送走馬承受康識回朝，東向行十數里，本有順手牽羊，乘便掩擊的機會，卻故意折回岷州，讓對方喪失警惕，到半夜才出其不意突襲，確是名將本色。《种太尉傳》記載這一戰斬獲吐蕃首領廝鐸彎，很可能就是前引《長編》所謂的宗哥首領。由於鬼章逃去，宋廷高價懸紅緝拿鬼章和冷雞朴：

庚戌詔：「鬼章、冷雞朴驅率蕃部為寇，使諸族帳不得安居。諸人及生熟蕃部得鬼章首來獻，授左藏庫使，賞錢五千緡，與本族巡檢使。得冷雞朴，授東頭供奉官，賞錢三千緡，與本族巡檢。並依舊官給俸。如生得鬼章、冷雞朴，賞格外更與優獎。鬼章、冷雞朴如能悔過歸順，官賞亦如之。令熙河路經略司榜諭。」³⁶

宋朝的官方史書，有的將此役與六逋宗之役混為一談。如《宋會要》載：

神宗熙寧八年，董氈將青唐結鬼章與冷雞朴大入寇，邊遣內侍省押班李憲捕之。十年，鬼章驅誘熟羌圍岷州城寨，占據鐵城，憲命种諤夜出兵二千，度洮

³³ 《种太尉傳》，頁3a。

³⁴ 清張彥篤(修)、包永昌(纂)：《洮州廳志》，收入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編輯委員會(編)：《中國西北文獻叢書》(蘭州：蘭州古籍書店，1990年)第四十九卷，卷二，頁十六a-b。

³⁵ 王存(1023-1101)等：《元豐九域志》(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卷三，頁130。

³⁶ 《長編》卷二七九，頁6846。

水，直抵鐵城。鬼章兵潰，臨斬冷雞朴。於是董氈惱懼，遣首領入朝謝罪。詔以董氈為都首領，結鬼章為廓州刺史。³⁷

以上這段文字有幾處錯誤。如前所述神宗遣內侍省押班李憲往熙河，確屬鬼章與冷雞朴「大入寇」的結果，但不在熙寧八年，而是九年年底。「青唐結鬼章」一名的「唐」字亦誤。更大的錯誤是將鐵城之役與六逋宗之役混為一談。從「度洮水，直抵鐵城」的文理表面上看，鐵城在洮水以西，因此知岷州种諤必須渡洮水，直抵鐵城。可是剛才已經說到，鐵城在岷州以東八十里，而岷州在洮水東岸，可見种諤進軍鐵城其實無需渡洮水，如果這樣做的話，反過來只能和鐵城背道而馳！以下史文馬上具載斬冷雞朴，董氈懼而入貢等六逋宗之役的事，可見史臣只是非常表面地從种諤兩次戰役的對手都是鬼章，就誤以為是同一場戰役，而沒有根究鐵城的方位，誤把鐵城當作洮西的地點，這便露出破綻來了。反觀《長編》、《宋史》關於鐵城之戰的記載，都沒有渡洮一事，更說明修撰《宋會要》的史臣不究本末，將兩件事混為一談。這可能是單純地出於節省文字的需要，但結果卻令事實糾纏不清。

其實鐵城之戰的規模不大。鬼章的兵力，《長編》據范育〈种諤墓志〉作三萬，³⁸《宋史》則失載。至於种諤的兵力，趙起和李燾都作二千人。斬首八百級，全軍平均2.5人斬一級，也算不錯，但和六逋宗之役斬七千級相比，不可同日而語。對宋軍來說，鐵城之戰是一場守勢作戰。种諤運用了彈性防禦的手段，³⁹出其不意，先發制人，瓦解了正在部署攻勢的敵軍，自此「岷境屬羌，不敢復貳」，宋軍便轉入攻勢，發動六逋宗之役。

作戰過程

《宋史·李憲傳》對六逋宗之役僅作如下記載：

冷雞朴誘山後生羌擾邊，木征請自效，眾以為不可。憲曰：「何傷乎！羌人天性畏服貴種。」聽之往。木征盛裝以出，眾聳視，皆無鬥志，師乘之，殺獲萬計，斬冷雞朴。⁴⁰

³⁷ 《宋會要》兵九，頁6906上。

³⁸ 《長編》卷二七九，頁6827。

³⁹ 有關北宋運用彈性戰略防禦，參曾瑞龍：〈北宋對外戰爭中的彈性戰略防禦——以宋夏洪德城戰役為例〉，《史叢》第三期（1998年），頁143-72。

⁴⁰ 《宋史》卷四六七〈宦者李憲傳〉，頁13639。《東都事略·李憲傳》的記載略同。見王稱（?-約1200）：《東都事略》（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91年），卷一二〇〈宦者李憲傳〉，頁1861。

本來殺獲萬計已算了不起的大勝仗，可是主帥的傳中連會戰地點也失載，是後世難以以為這次戰役命名的一個因素。《長編》對作戰經過的描述大致上同《宋史·李憲傳》：

先是，冷雞朴誘山後生羌擾邊，木征請自效，眾以為不可。憲曰：『何傷？羌戎畏服貴種，其天性也。』木征盛裝以出，諸戎聳視，皆無鬥志，我師乘之，獲級生降以萬計，臨陣斬冷雞朴，董氈懼，因作旁行書諭之，遂入貢(此據憲本傳附見)。⁴¹

這段史料和《宋史·李憲傳》幾乎完全一致，據李燾注中解釋，是參照了國史〈李憲傳〉的結果。很可能，《宋史·李憲傳》、《東都事略·李憲傳》和《長編》對作戰經過的描述都是來自同一藍本《國史·李憲傳》。根據這些史料顯示，這次勝利得來相當容易，因為唃廝囉的孫兒木征(?-1077)三年前已降宋，而「羌人天性畏服貴種」，一見木征盛裝出陣，馬上就士無鬥志，很輕易地被宋軍所擊潰了。祝啟源《唃廝囉——宋代藏族政權》在章節中沒有提及此役，唯在〈木征〉及〈大事年表〉兩處，均以一句述及木征助宋擒隆吉卜(即冷雞朴)，注引的也是《宋史·李憲傳》。⁴²由於會戰地點失載，加上這好像是很輕易得來的勝利，筆者初時也一樣沒有察覺這是比較重要的戰役。

至於《宋史·种諤傳》，對此也輕輕帶過，說：「從李憲出塞，收洮州，下〔『下』字疑為『六』字之誤〕逋宗、講珠、東宜諸城，掩至大河，斬首七千級。」《東都事略·种諤傳》則謂：「李憲措置熙河邊事，分兵為七軍，諤將左軍自岷州出塞，收洮州，遷東上閣門使、文州刺史。」⁴³

這兩個〈种諤傳〉都以很簡略的筆墨來描述此事，和种諤取綏州、破米脂、議築橫山等重要的軍事活動不可同日而語，可是這裏透露出兩點訊息：首先是對作戰範圍有一個大致眉目。這似乎是很大規模的征戰(campaign)，而不僅僅是一次會戰(battle)——种諤一直從岷州打到洮州，然後取道講珠城直抵黃河，作戰縱深接近200公里。其次，李憲「分兵為七軍」，所指的不知是平時編制還是戰役編制，若然屬於戰役編制，則出動的兵力似乎相當可觀。《宋史·兵志二》載有李憲重新整編熙河駐防部隊為「軍」的事情，說：

六年，熙河路經略制置李憲言：「本路雖有九將之名，其實數目多闕，緩急不給驅使。又蕃漢雜為一軍，嗜好言語不同，部分居止悉皆不便，今未出戰，其

⁴¹ 《長編》卷二八二，頁6904。

⁴² 祝啟源：《唃廝囉——宋代藏族政權》，頁248，268及303。

⁴³ 《宋史》卷三三五〈种世衡傳附子諤傳〉，頁10746；《東都事略》卷六一〈种世衡傳附子諤傳〉，頁926。

害已多，非李靖所謂蕃漢自為一法之意。若將本路九將併為五軍，各定立五軍將、副，及都、同總領蕃兵將，使正兵合漢弓箭手自為一軍，其蕃兵亦各自為一軍。臨敵之際，首用蕃兵，繼以漢兵，必有成效，兼可減併將、副及部隊將員，於事為便。」詔從之。⁴⁴

李憲將熙河九將編為五軍，若每將作4,500人計，總計便有40,500人。若五個軍相等於九個將，每個軍便有8,000人左右，七個軍便可達56,000人。⁴⁵事實上，熙寧十年二月，亦即六逋宗之役發動的前夕，王韶批評李憲「欲聚兵六萬人為攻討計，臣以為用眾不如用寡」。這是王韶任樞密副使期間最後的幾個奏疏之一，以他在樞密院所能看到的文件來看，王韶對李憲意圖的判斷應有一定根據。換言之，李憲的動員是以60,000人為基準，而實際具備的也很可能非常接近這個數字。從「臣以為用眾不如用寡」的說話看出，這對王韶而言已是相當大規模的兵力集結。此外《長編》載有彭汝勵的奏章，說「今日之役最為大者，洮河之役」，⁴⁶也反映出這一役規模之大。

《長編》還載有六逋宗之役後李憲奏上功狀，朝廷論功行賞的紀錄，是較有價值的一段，也可看出動員將佐之眾：

秦鳳、熙河路計議措置邊事李憲上攻山後生羌禽冷雞朴功狀，詔以熙河路經略使、司封郎中、天章閣待制張誥為右諫議大夫，權發遣秦鳳路轉運副使、降授太子中允趙濟復官、遷一資，權轉運判官、太子中舍孫迴減磨勘二年，權提點刑獄、主客郎中鄭民憲降敕獎諭；中軍將、引進使、英州刺史王君萬重傷，復客省使、達州團練使，賜絹二百；副將、崇儀使張若訥遷內藏庫使；前軍將、皇城使姚麟為西上閣門使、英州刺史，將、內殿承制孫咸寧為禮賓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左軍將、引進副使种諤為東上閣門使、文州刺史，副將、西京作坊使楊萬為宮苑使；右軍將、皇城使、文州刺史韓存寶為西上閣門使、忠州團練使，副將、引進副使李浩為東上閣門使、果州團練使，副將、左藏庫使夏元象為皇城使、康州刺史。壬戌，以昭宣使、嘉州防禦使、入內押班李憲為宣政使、入內副都知，左軍西京左藏庫副使徐禹臣，右軍內殿崇班張承鑑等七人轉官、減年、循資有差；蕃官皇城使、康州刺史包順二子各轉一資。皆賞功也。⁴⁷

這裏我們看見一個頗為完整的戰鬥序列——前、左、右、中軍各有將、副，之下還有蕃兵。雖然這裏好像只有四軍的編制，而不是七軍，有些尚待弄清楚的地方，但

⁴⁴ 《宋史》卷一八八〈兵志二〉，頁4628-29。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⁴⁵ 郭逵征交趾，「凡兵之在行者十萬人」，整編九個軍，編制略大一點，每個軍約11,000人。見《長編》卷二七九，頁6844。

⁴⁶ 《長編》卷二八〇，頁6885；卷二八二，頁6905。

⁴⁷ 同上注，卷二八二，頁6903-4。

這是規模相當大的一場戰役，是可以初步確定的。可是，這份遷官的紀錄還有一處值得再分析下去，就是幾個主要將領所遷的資序。王君萬自引進使遷客省使，姚麟、韓存寶自皇城使遷西上閣門使，都只是一資；至於种諤和李浩所陞的官比較大，兩個都從引進副使越過了客省副使和西上閣門使而遷為東上閣門使。《宋史·种諤傳》中斬首七千級的記載，也許可以為這次遷官下一個注腳。

以下引出趙起《种太尉傳》中關於六逋宗之役的記載，整場戰役的過程便可得到一個梗概。

〔熙寧〕十年，春三月，入內都都知李憲以五軍進討六逋宗、講珠等城，姚麟、孫咸寧以涇原兵為先鋒〔疑當作鋒〕，夏元象、劉昌祚以秦鳳兵為殿後，苗授、王君曼以熙州兵穎中軍，韓存寶以河州兵為右軍，公領岷州兵為左軍。是戰，以存寶對敵冷雞朴新破景思立，威勢方震蕩河湟，矢石接，前行卻，存寶不能支，馳報中軍府。公批掌為麾從劉瑠輩曰：「存寶輕而寡謀，敗乃公事矣！」中軍府始不欲任公，知事急，召公。公至，徐分勁弩五百，先扼六逋宗左右三谷，次命熟首包順以五百騎，合姚麟五百騎，楊曼以短兵五百人殿，旁趣不意。自辰至申，大會其眾，擒冷雞朴，李密撒，掠諸河曲而還，斬首一萬級，公軍獨得七千，遂加東〔按此處疑脫一「上」字〕閣門使、文州刺史。⁴⁸

據以上記載，李憲是在右翼惡化的重要關頭，召喚种諤從左翼出擊，反敗為勝，會戰過程與周世宗高平會戰相似。從斬冷雞朴一事，可以斷定為六逋宗之役的紀事片斷。《种太尉傳》這段和前引《長編》的一段記載有很多可以互相詮釋的地方。兩段記載中五軍主將的姓名和置陣方位大體相符。據《長編》論功行賞的記載所提及的戰鬥序列，中軍將王君萬，副將張若訥，前軍將姚麟，副將孫咸寧，左軍將种諤，副將楊萬，右軍將韓存寶，副將李浩、夏元象，欠後軍將副姓名。據《种太尉傳》列載，「苗授、王君曼以熙州兵穎中軍」。苗授(1029–1095)是王韶開熙河的主要將領，戰功不亞於景思立、王君萬，《長編》不載苗授姓名，不知何故。至於左軍种諤、右軍韓存寶，《長編》、《种太尉傳》皆同。此外《种太尉傳》載，「夏元象、劉昌祚以秦鳳兵殿後」，補充了《長編》失載後軍主將的闕漏。況且《長編》的記載，諸軍都只列一名副將，右軍不應獨有兩名。參考了《种太尉傳》及《東都事略·劉昌祚傳》載「遷六宅使，從王中正擊茂州羌，又從李憲討後山常陽等族，以功遷西上閣門使、知河州」，估計「李浩為果州團練使」之下，也許脫漏了「後軍將某官劉昌祚為西上閣門使」一句，才到「副將、左藏庫使夏元象為皇城使、康州刺史」一句。

對於戰情的記載，兩段史料則存在較大差距，《長編》主要根據國史《李憲傳》，而《种太尉傳》的記載則不見於他書，可是有兩處地方也值得一提。首先是《長編》提

⁴⁸ 《种太尉傳》，頁3b。標點符號為筆者所加，以下同。

及王君萬重傷一事值得注意。王君萬是中軍將，竟也身受重傷，其戰情之緊急，可以想見。同樣，《种太尉傳》所描述的戰況，初期也是險象環生，「矢石接，前行卻，存寶不能支，馳報中軍府」。連种諤也預計到「敗乃公事矣」。從姚麟的前軍能參與後來的反擊行動，而右軍則不能支，中軍將王君萬也身受重傷看來，會戰初期最激烈的戰鬥應該在右翼，而隨著右軍不支而漸及中路。這時李憲唯有急召他本來不大信任的种諤，以左軍加上姚麟前軍的騎兵，發動反擊，一舉反敗為勝。當然，以种諤為焦點來撰寫的《种太尉傳》，不必定要顧及王君萬有沒有受傷這件事實，然而兩段史料都同樣帶出作戰過程不甚順利的訊息。相反《宋史·李憲傳》則敘事有簡單化的傾向，說木征一登場，羌眾「畏服貴種」，馬上就士無鬥志了。顯然，《長編》只是將李憲所上功狀和國史〈李憲傳〉這兩段不同來源的史料前後並置，而沒有根究詳細的作戰經過。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楊萬和包順的戰功，《种太尉傳》和《長編》第一段史料也若合符契。《种太尉傳》記載，种諤自左翼反擊的時候，「命熟酋包順以五百騎，合姚麟五百騎，楊曼以短兵五百人殿，旁趣不意」，《長編》則記載「副將、西京作坊使楊萬為宮苑使，……蕃官皇城使、康州刺史包順二子各轉一資，皆賞功也」。兩人的遷官都和特殊戰功有關。六月，包順等蕃將的戰功獲得進一步追認：

壬辰，秦鳳、熙河路計議措置邊事司言：「山西得功蕃官皇城使、康州刺史包順，忠白向漢，眾所推服。昨日，岷南出兵，兼旬深入，竭數點集差次，功狀不在行營將副之下。今所推賞，未厭眾論。及內藏庫副使趙紹忠、供備庫使包誠皆戮力效死，亦望別議賞典。」詔順領榮州團練使。又與一子轉資；誠為文思使，紹宗為崇儀使。⁴⁹

和种諤一起自引進副使遷為東上閤門使還有李浩。《宋史·李浩傳》載：

李憲討山後羌，浩將右軍至合龍嶺會戰，遣降羌乞瓌輕騎突敵帳，俘其酋冷雞朴、李密撒，馘三千。遷東上閤門使。⁵⁰

這段記載字數不多，卻已包括了幾條線索，足以令我們相信這是六逋宗之役的記載，如主帥是李憲，李浩所將是右軍，擒冷雞朴、李密撒，戰後自引進副使遷為東上閤門使等。值得注意的是，這裏標出「合龍嶺」的地名，為會戰地點下了一個較為具體的注腳，可是這到底只是右軍駐陣的山頭，還是整個戰場的地名，仍然無從判斷。其次，《宋史·李浩傳》載冷雞朴被李浩的部下所擒一事，正說明《种太尉傳》中，冷雞朴和宋右軍對陣的戰情描述。冷雞朴初時將攻擊矛頭對準韓存寶，他後來兵敗的

⁴⁹ 《長編》卷二八三，頁6924。

⁵⁰ 《宋史》卷三百五十〈李浩傳〉，頁11079。

時候也被右軍轄下的蕃兵所擒。最後，冷雞朴為李浩的部下所擒，解釋了何以李浩由引進副使擢遷為東上閣門使。

整場戰役，种諤和李浩的戰功並駕齊驅，一個斬獲特多，一個擒獲敵首。相對上，其他將領的戰功都無甚足書，其傳記所述也相對上簡略。《宋史·王君萬傳》說：「累官客省使，為副總管。坐貸結糶錢數萬緡，為轉運使孫迥所糾，貶秩一等。討西山、鐵城有功，復故官職。」據前引《長編》所載，王君萬因力戰受重傷而復客省使，這裏說的「討西山、鐵城」意義不明確，有可能將鐵城之戰與六通宗混為一談。《宋史·姚麟傳》載「積功至皇城使，為秦鳳副總管。從李憲討生羌，擒冷雞朴。再轉東上閣門使、英州刺史」。⁵¹ 據前引《長編》所載，「前軍將、皇城使姚麟為西上閣門使、英州刺史」，遷為東上閣門使是「再轉」官之後的事。

《東都事略·姚麟傳》對戰情的描寫比《宋史》較為詳盡，也可以和《种太尉傳》互相參照：

以師援李憲兵，為前軍，兵〔此處疑脫一「虜」字或「賊」字〕十餘萬，鋒銳甚。麟謂其副曰：「賊眾我寡，將迎擊之。且以臨大軍之聲，必濟。」即馳騎中軍告急。憲進兵。麟繼使人聲言：「姚公已破賊！」眾聞，歡趨。麟度憲不遠，鼓而出。戰方酣，大軍沓至，大破之，賊潰走。拜西上閣門使、英州刺史。⁵²

與《种太尉傳》相同，《東都事略·姚麟傳》也是將焦點放在傳主身上而忽略了其他人的戰功，可是它和以上所引史料仍然有不少吻合之處。首先是姚麟將前軍一事，各書皆同。繼而，敵軍之眾多和初期戰裏的處於劣勢，《東都事略·姚麟傳》和《种太尉傳》分別從前軍和左軍的角度描繪出來。敵軍的數量，《東都事略·姚麟傳》標出十餘萬，而《种太尉傳》只泛言「威勢方震蕩河湟」，反映出左軍對敵情判斷與前軍尚有一段距離。跟著，我們看到右軍韓存寶和前軍姚麟分別向李憲求援。當時中軍尚未直接捲入戰鬥，然而兩處史料都提到李憲迅速的反應，令局勢轉危為安。據《种太尉傳》，李憲認識到局勢危急後，馬上召來素有成見的种諤，委以反擊的重任。《東都事略·姚麟傳》沒有提及种諤，但也認同李憲立即進兵這一事實。至於姚麟使人虛言破敵來促使李憲加快進軍，和《种太尉傳》力寫种諤破敵的筆調，固然有抬高傳主的意圖，也是傳記作者視角偏於一端所致，不足深論。至於王君萬力戰受傷，以及木征盛裝出陣，令羌人士氣下挫，大抵都是到中軍投入作戰之後所發生的事情。

從目前僅有史料來看，种諤的斬獲多於姚麟是無庸置疑的。《東都事略·姚麟傳》不書斬級數字，只說敵軍「潰走」而已；相反《种太尉傳》卻明言「斬首一萬級，公軍獨

⁵¹ 同上注，卷三百五十〈王君萬傳〉，頁11070；卷三百四九〈姚兕傳附麟傳〉，頁11058。

⁵² 《東都事略》卷一〇四〈姚兕傳附弟麟傳〉，頁1593。

得七千」，與《宋史·李憲傳》「殺獲萬計」及《宋史·种諤傳》「掩至大河，斬首七千級」的記載可以互相印證。當然此類傳記史料難免有抬高傳主和渲染戰功的意味，但另一方面，如果認同种諤預先部署了弩手控扼六逋宗左右三谷，「旁趣不意」，楔入敵軍側翼的行動與事實沒有很大出入的話，那麼他能取得較大斬獲，也不是很奇怪的事情。這從姚麟自皇城使遷官為西上閣門使，而种諤自引進副使遷為東上閣門使，也可以看出戰功高下有別。

綜合了《宋史》、《東都事略》和《長編》的相關記載之後，可以發現《种太尉傳》所描述的六逋宗戰役確曾發生。與《种太尉傳》相同，《宋史·李憲傳》、《東都事略·姚麟傳》和《宋史·李浩傳》都將焦點放在傳主身上而忽略了其他人的戰功，細節略有不同，然而斬級數字的記載卻沒有很大出入。《种太尉傳》所謂韓存寶「不能支」，《長編》說王君萬重傷一事，或都反映出諸將初期的作戰過程有欠順利，而戰果集中在种諤、李浩兩軍的事實。

六逋宗之役以宋軍大勝結束。《种太尉傳》說：「秋七月，鬼章屯疊州，合董氈，謀報六逋宗之役。公請伐其謀，以奪彼〔心〕。〔李〕不從，〔公〕乃使人間路剽殺使者，奪其書，彼計遂解。」⁵³ 這條史料點出了六逋宗之役的命名，也交代了作戰的餘波。

六逋宗之役的影響及其遭受忽視的原因

六逋宗之役加強了宋人在洮河地區的統治，是殲滅了冷雞朴，對鬼章的勢力也構成嚴重打擊的重要戰役。如《宋史·苗授傳》便說：

以為秦鳳副總管，徙熙河，復知河州。副李憲討生羌於露骨山，斬首萬級，獲其大酋冷雞朴，羌族十萬七千帳內附，威震洮西。拜昌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⁵⁴

《長編》記載說「董氈懼，因作旁行書諭之，遂入貢」。⁵⁵ 熙寧十年十月，即六逋宗之役後半年，董氈入貢「謝罪」，宋廷考慮到邊費浩大，下詔授董氈為都首領，青宜結鬼章為廓州刺史，派王君萬等迎接使臣。

《長編》後來在元祐二年的記事追述鬼章始末，有一段頗為含混的說明：

⁵³ 《种太尉傳》，頁3b，字據臺北穴硯齋本頁4a補入。

⁵⁴ 《宋史》卷三百五十〈苗授傳〉，頁11068。《東都事略》卷八四〈苗授傳〉，頁1284略同。

⁵⁵ 《長編》卷二八二，頁6904。《東都事略》卷八四〈苗授傳〉，頁1284略同。

董氈籍此一戰之勝，遂復其國，而王師亦不復西矣。神宗深軫之，乃下詔獲鬼章，官正使，金帛各數千，命李憲等購之十餘年，不能得，竟以漢爵縻之，歲有廩賜。⁵⁶

這段話可能是沿襲元祐史臣，與《長編》之前的記載不很相符。「董氈籍此一戰之勝」指的是踏白城之戰斬景思立、王寧一事，從前文後理可以得知；然而宋人在熙、豐之際，從未能兼併青唐，董氈「遂復其國」的話不知何所指。「而王師亦不復西矣」一句，如果純粹是指宋人沒有渡河西向的話，則問題不大；但如果理解為宋人不再進一步向吐蕃用兵的話，便與六逋宗之役的史實不符。六逋宗之役前，宋人確曾高價懸紅緝拿鬼章和冷雞朴，然而隨著董氈入貢，關係改善，宋廷對鬼章「以漢爵縻之，歲有廩賜」，是六逋宗之役半年後的事情，並非「購之十餘年，不能得」的曲意妥協。同年十二月，董氈貢使到達開封，送上珍珠、象牙、馬匹等，宋廷依價「回賜」，並授董氈西平軍節度使。元豐元年(1078)，宋神宗派供奉官郭英「慰諭」青唐，贈送衣服、器皿。⁵⁷次年，董氈使者來開封貢馬，宋神宗大悅，自此雙方關係穩定，為元豐四年共同攻略夏國的軍事合作打下基礎。

六逋宗之役作為熙河開邊的總結性戰役，對宋軍也具有人事上的意義。從將領的名單也可以看得出來——除了夏元象和孫咸寧不是很有名，及幾位成名武將如郭達(1021-1088)、燕達、姚兕等因為經略交趾的緣故未能與役之外，苗授、王君萬、种諤、姚麟、韓存寶、李浩和劉昌祚都是熙、豐最負盛名的武將。當時沒有任何一場戰役比六逋宗之役的戰鬥序列更接近元豐四年(1081)的靈夏之役，後者在熙河方面主帥是李憲，副將李浩；涇原方面主將是劉昌祚，副將姚麟；環慶方面是高遵裕；鄜延方面是种諤，手下第一將是夏元象；麟府方面是王中正。這五路主將全都先後參與過熙河之役，其中熙、延、渭三個路的將副幾乎是六逋宗之役的原班子。因此，也可以說在人事上，六逋宗之役是後來靈、夏遠征的縮影。

六逋宗之役既是這樣重要，為甚麼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首先，史臣的誤書，將兩事誤為一事，或將兩人誤為一人，確實並不罕見，有時不一定要解釋甚麼原因。可是人們的主觀當中，對戰功(merit)如何詮釋，也不是無根可尋的。在英文當中，「作戰目標」和「客觀」是同一個字(objective)。一般來說，作戰目標達到了，通常就有戰功。可「作戰目標」和「戰功」始終是兩回事，後者含有很大主觀成分，不能被絕對客觀地界定。軍隊只能完成「作戰目標」，可是「戰功」高不高還要看政府，甚至民間的評價。事實上，六逋宗之役也有一些特殊的地方，或會增加史臣漏書、誤書，或故意低調處理的可能性。

⁵⁶ 《長編》卷四百二，頁9777。

⁵⁷ 宋與青唐恢復關係，詳見祝啟源：《唵嘶囉——宋代藏族政權》，頁116-18。

李憲主持熙河軍事惹起很大爭論，或令其戰功蒙上陰影。當時士大夫輿論所關注的，是李憲以宦者為一方主帥這一點，而不在殺獲萬計，斬冷雞朴一事。早在李憲出師之前，御史中丞鄧潤甫、御史周尹、蔡承禧和彭汝礪已強烈批評，說：以「中人為將帥，……勢有所不便也。」具體來說，有甚麼不便呢？他們認為，以宦者將帥害處有二：首先，這違反了太祖的規制；第二，李憲作為皇帝的親信，是人所共知，一旦出掌帥印，必然導致「無人敢議其是非」。批評中有某些言論非常激烈，比如認為維護政治的長遠利益，遠較達成軍事目標更為重要。以中人為將帥，被認為與政治的長遠利益有所抵觸。整個奏章最具概括性的話是這一句：「陛下以一方之事屬於憲，後以為例，則兵權必歸焉。故臣等以謂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禍小，成功其禍大。」⁵⁸ 如果說阻止鬼章為患是宋人的軍事目標的話，那麼批評者便將政治利益和軍事目標罕有地對立起來——李憲若達成軍事目標，會對長遠的政治利益構成妨害。

士大夫動輒引述唐代宦官之禍及宋太祖對宦官的政策來反對，可說是象徵和理念層次上的抗拒，還未觸及實質運作上的要害，未免老生常談。本來唐代宦官掌禁軍發生種種弊端，讀史者已是耳熟能詳。到宋初，宦官雖然廣泛地參與軍事，但卻沒有造成較大禍亂，其成功地融入軍政制度，受到外廷機制，特別是樞密院的監管，是重要原因。「以闈為將」，被認為是宋初皇帝和士大夫對宦官身分的認定。⁵⁹ 在這種前提之下，士大夫似乎不應抗拒闈將。的確，就李憲的例子來看，士大夫並不怎樣懷疑他的將才，鄧潤甫、周尹、蔡承禧和彭汝礪雖然極力批評，但也承認「自開元以來，使中人為將，亦或成功」。彭汝礪後來亦一再強調他並不擔心李憲不能成功，「臣昔者論不當付寺人以兵，陛下以為非是，及李憲師出，果獲鬼章〔『獲』字必誤〕，自洮以西遂至無事，而臣言絀矣。而臣之言非以憲為不足以成功，所慮亦不在憲」。⁶⁰ 批評者沒有否定宦者的才幹及其達成軍事目標的可能性。

以現實層面來看，批評的重點不在於是否應該以宦者為將，而在於是否應該以宦者為帥。「中外之論，皆謂憲雖名為計議措置邊事，而軍前諸將皆受憲節制，其實大帥」。⁶¹ 宋代以宦者為帥並非沒有先例，宋太宗以王繼恩定蜀便是其一。然而宦官要當上路帥並不容易。宋仁宗慶曆以來，陝西五路經略安撫使例由文臣充任，武臣為副，有時可以權攝，如尹洙罷帥涇原，以狄青知渭州，⁶² 但不是常制。或許可以說，

⁵⁸ 《長編》卷二七九，頁6839，6840-42，6841。

⁵⁹ 柳立言：〈以闈為將：宋初君主與士大夫對宦官角色的認定〉，《大陸雜誌》第九十一卷第三期（1995年），頁1-20。

⁶⁰ 《長編》卷二七九，頁6840；卷二八二，頁6904-5。

⁶¹ 同上注，卷二七九，頁6839。

⁶² 同上注，卷一五〇，頁3626-32。

正因為宦官融入了軍政制度，他們更不容易超越其身分，去當文臣才可以做的路帥。當這種機會確實來臨，士大夫便擔心一向以來的互相維制受到破壞，「藝祖朝，中人官不過副使，至于今日，未嘗有專為將帥，軍前將校皆受其約束者」。鄧潤甫、周尹、蔡承禧和彭汝礪更提醒「熙河軍吏，以陛下俾親信之出也，有功必推憲，其無功敢議憲以聞上乎？」⁶³李憲打了勝仗之後，彭汝礪又再上言：

憲辟薛昌朝不聽，切齒扼腕，以為為儒所賣，自是不復回顧士人矣。張茂則以河事頡頏作氣，官屬罕見其面，雖達官大吏，俯首不敢與抗，而姦詐之人稍復趨附，以僥倖萬一之時，陛下以幾觀之，使其有可以輕士之勢，其心如何也？且朝廷比年之役，其最貽陛下憂者、洮西、閩、蜀；其最計議論者，惟瀋川之役；今日之役最為大者，洮河之役。數者皆在寺人，是陛下所愛養尊寵之士大夫無一可屬任者矣。且彼初非無敏健精悍可用之力，及稍任事者，則窺覷玩弄、籍蹈士大夫矣。⁶⁴

說穿了，是怕宦者得勢，會凌迫士大夫。應該指出的是，這和熙豐時代神宗信任石得一、宋用臣，並以皇城卒偵查臣民細事這個政治氣候也有一定關聯。某些士大夫感受到不被信任，與皇帝的關係出現警號。換言之，在現實層面上，宦者李憲和某些士大夫發生了權力衝突。當這種衝突被引伸理解為對整個士大夫階層發生威脅的時候，便滋生種種過激的批評。

其實不獨士大夫，种諤和李憲的關係似乎也很惡劣。《种太尉傳》說「中軍府始不欲任公」，但李憲看來並沒有抹煞种諤的戰功。种諤在六逋宗之役斬首七千級，自引進副使遷東上閣門使，諸將中除了擒冷雞朴的李浩外，罕有其比。因此，李憲對种諤未必很差，相反「中軍府始不欲任公」的話可能是种諤討厭李憲的文飾之辭。

當然，神宗仍然信任李憲，而彭汝礪等批評者對當時的影響力有多大也不容易估計。可是這些對李憲不利的言論對史書的編纂或許發生了一些作用，比如李燾便採用非常審慎的立場，用保留的語氣說：「秦鳳、熙河路計議措置邊事李憲上攻山後生羌禽冷雞朴功狀。」而且聲明「此據憲本傳附見」，似乎在避免大書李憲的戰功。至於《宋史·李憲傳》，在記載了這次的戰功的同時，史臣亦大書當時文臣對宦官主兵的批評和熙河邊費之鉅，如何「貽患中國」等。總之，如何理解和詮釋六逋宗的戰功，批評者是以政治壓倒軍事的角度來理解的，而史臣對於大書宦者戰功，可能也有所保留，而寧願彈「以夷制夷」的老調，強調木征角色的重要——他一盛裝登場，馬上就令蕃人望風而潰。至於种諤、姚麟和李浩奮戰的事蹟，反而未能佔到多少篇幅。

⁶³ 同上注，卷二七九，頁6840-41，6842。

⁶⁴ 同上注，卷二八二，頁6904-5。

另外不可忽略的是六逋宗在戰略地理上的模糊性，令這場仗難以獲得統一命名。《宋史·李浩傳》以此役為「會戰合龍嶺」，沒有標出關鍵地名六逋宗；而大部分將帥，甚至連李憲的傳中也沒有說明戰場在何處，或者有的士大夫索性籠統地稱之為「洮河之役」便算。⁶⁵ 六逋宗是有城的。《种太尉傳》中記載「李憲以五軍進討六逋宗、講珠等城」，《宋史·种諤傳》提及「從李憲出塞，收洮州，下逋宗、講珠、東宜諸城」，《宋史·游師雄傳》亦言「〔姚〕兕破六逋宗城」，⁶⁶ 可是具體方位不明。譚其驤及鈴木隆一二氏亦均未能在地圖上加以標示。⁶⁷

此後六逋宗好像也沒有變成政治軍事性的據點，也就是說，沒有納入宋人的城寨系統中。目前斷定青海一帶古城的調查和發掘，主要的斷代準則是古錢、陶瓷殘片等種種宋人移民和駐軍的跡象，再配合文字史料來加以考證。在這個過程中，《宋史·地理志》所載堡寨之間的相距里數，就會成為重要的參考，甚至可以為實地調查圈定一個範圍。⁶⁸ 可是宋人此後有沒有在六逋宗長期駐軍，從文字史料上還找不到確實證據，令確定六逋宗的方位難上加難。

不過從現有的史料來看，六逋宗和兩個地點密切相關，一個是洮州，另一個是講珠城，這是可以初步考定的。前引《宋史·种諤傳》提及「從李憲出塞，收洮州，下逋宗、講珠、東宜諸城，掩至大河」這條路線，顯示六逋宗位於洮州往講珠的交通線上。如前所述，《宋史·李浩傳》已經提出一條重要線索，就是以此役「會戰合龍嶺」一事。《洮州廳志》卷二載有「合龍山」的地名，謂在城南十五里楊家溝，同卷「楊家溝」條卻說距城僅十里。⁶⁹ 不過無論如何，如果《宋史·李浩傳》「會戰合龍嶺」之處即洮州合龍山，那麼擒獲冷雞朴的地點就在城南不遠處。可是合龍嶺和六逋宗的關係如何呢？從《种太尉傳》說种諤遣兵「先扼六逋宗左右三谷」，後來董氈又「謀報六逋宗之役」，顯見种諤一軍是在六逋宗附近。換言之，合龍嶺和六逋宗的關係，關鍵在左右兩軍的距離；但由於左右兩軍的距離不可能確知，故只能說六逋宗的地點就在洮州附近不遠。

⁶⁵ 同上注。

⁶⁶ 《宋史》卷三百三十二〈游師雄傳〉，頁10689。《宋史》卷三百四十九〈姚兕傳〉，頁11058文句略有出入，唯大意相近。

⁶⁷ 譚其驤等：《中國歷史地圖集》（上海：地圖出版社，1982年），《宋遼金時期》分冊，「秦鳳路」頁。鈴木隆一：〈青唐をめぐる交通路〉，原刊於《早稻田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紀要》別冊第八集（1981年）；收入《中國關係論說資料》卷24（1982年），第三分冊下，頁747-52。

⁶⁸ 有關研究，參陳守忠：《河隴史地考述》；宋秀芳：〈宋代河湟吐蕃地區歷史地理問題探討〉，載《藏學研究論叢》卷五（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181-203；李智信：《青海古城考辨》（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5年）。

⁶⁹ 《洮州廳志》卷二，頁10a及24b。

另一個和六逋宗關係密切的地點是講珠，《种太尉傳》中記載「李憲以五軍進討六逋宗、講珠等城」，及《宋史·种諤傳》提及「從李憲出塞，收洮州，下逋宗、講珠、東宜諸城，掩至大河」等等，都是將六逋宗和講珠相提並論的。講珠成為戰略焦點，是在元祐二年(1087)的洮河之役，《宋史·游師雄傳》謂：

吐蕃寇邊，其酋鬼章青宜結乘間脅屬羌構夏人為亂，謀分據熙河。……吐蕃將攻河州，〔游〕師雄欲先發以制之，請於帥劉舜卿。……議三日乃定，遂分兵為二，姚兕將而左，种誼將而右。兕破六逋宗城，斬首千五百級，攻講朱城，斷黃河飛梁，青唐十萬眾不得度。誼破洮州，擒鬼章及大首領九人，斬首千七百級。⁷⁰

對姚兕來說，六逋宗是作為到達講朱城之前的一個要點來攻取的。他攻取講珠，切斷黃河飛橋，使鬼章成為孤軍。然而當時洮州正為鬼章所盤據，姚兕進軍路線的初段，即到達六逋宗之前，不可能和十年前的种諤一致。據《東都事略·姚兕傳》，出擊的地點是河州，「兕自河州率兵破六逋宗城，夜遣驍將縱火講珠梁」。《東都事略·劉舜卿傳》也說「兕部洮西，領武勝正兵，合河州熟戶，擣講珠城，脅取六道〔『道』字疑衍〕逋宗部族」。⁷¹從游師雄策動這次攻城阻援行動的性質來看，六逋宗又不大可能距離洮州太近，而應在講珠城附近，否則姚兕脅取六逋宗部族之後，應順道進擊洮州；不應捨近圖遠，去取講珠。況且，姚兕出現在洮州外圍，也會令鬼章提高警覺，令种誼的突襲很難得手。因此，從六逋宗和講珠的關係及元祐二年洮河之役的過程來看，它應該是位於距離洮州相當一段距離，聲勢耳目不相接的地方。八月十五日作戰發動之後，「十六日，兕破倫布宗，百里間焚蕩無孑遺，斬首千餘級。十七日，攻講珠城，殺傷相當，日晡，焚其飛橋。……十八日晚，誼至洮州」。⁷²由河州到六逋宗，及由六逋宗到講珠城都只有一天路程。

可是講珠的方位也不是沒有疑問的。傳統文字史料似乎將講珠城定位在河州西北的黃河南岸。前引《宋史·游師雄傳》述及的黃河飛樑是一條線索，《宋史·种諤傳》提及「從李憲出塞，收洮州，下逋宗、講珠、東宜諸城，掩至大河」，加上本文注目的《种太尉傳》也記載「李憲以五軍進討六逋宗、講珠等城。……擒冷雞朴，李密撒，掠諸河曲而還」，都說明該城位於黃河之濱。近年學者採用這種說法的有鈴木隆一。

⁷⁰ 《宋史》卷三百三十二〈游師雄傳〉，頁10689。卷三百四十九〈姚兕傳〉，頁11058文句略有出入，唯大意相近。

⁷¹ 《東都事略》卷一百四〈姚兕傳〉，頁1592；卷八四〈劉舜卿傳〉，頁1289。

⁷² 《長編》卷四百四，頁9841及頁9842注引汪藻《青唐錄》皆同。倫布宗是六逋宗的清代音譯，中華書局標點本據之未改。另參汪藻：《青唐錄》，收入青海省民委少數民族古籍整理規劃辦公室（編）：《青海地方舊志五種》（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33。

鈴木氏將講朱定於河州踏白城以西，是由於熙寧七年王韶大破西蕃，木征降宋，時鬼章退保踏白城以西摩雅克族，「去河州百餘里」。⁷³ 後來摩雅克族亦降宋。至於其方位，根據《長編》熙寧八年一條記事：

熙河路洮西安撫司言：「熟戶摩雅克族麥熟，宗哥引兵鈔略，本司出兵千一百人防托，經略司亦出兵千人為聲援。今講朱一帶無事，兵並放還。」⁷⁴

這段記載將講珠城作為與摩雅克族對境的城寨，是可以體味得到的。摩雅克族既然在踏白城以西，「去河州百餘里」，因此鈴木氏將講珠的位置定作河州西北的黃河南岸上，去洮州甚遠。⁷⁵ 可是據祝啟源的考證，講珠飛橋並非架在黃河，而是大夏河上。祝氏引用了《長編》、《宋史·劉舜卿傳》、《宋史》及《東都事略》的〈姚兕傳〉，認為「這些記載，也都明確地指出，宋軍所焚之『河橋』、『浮橋』，乃講珠橋，即講珠城西之大夏河橋」。⁷⁶ 關於祝氏的說法，筆者一向是覺得很有啟發性的。因為我們不應該相信宋人記載上的「黃河」，一定是我們的黃河。光憑講珠城的「黃河飛橋」四個字，的確不能說講珠城就是在黃河邊上。因此，筆者在撰寫博士論文的時候，也曾採用了祝氏關於講珠城就在大夏河上，而不是在黃河邊上的說法。⁷⁷

可是在撰寫本文的時候，筆者再把祝氏的說法反復思考，覺得他的意見還未完全解決問題。首先，祝氏在1988年的著作未有回應鈴木隆一在1981年的論證。鈴木的看法雖然也沒有非常確鑿的證據，但因為他基本上是根據堡寨和部族之間的相對位置，來判斷講珠城在黃河邊上，要推翻他的看法必須提出反證。另外就是祝氏採用的那些資料，其實都沒有提及大夏河，每一條都只說明了姚兕所焚的是講珠橋，卻沒有明確的證據說講珠城位於大夏河上。比如《長編》的原文是「阿里骨發河北兵十萬，由講珠城橋渡河圍河州」，而宋軍則「遣總管姚兕部洮西，領武勝正兵合河州熟戶，擣講珠城，脇取倫布宗〔六逋宗〕部族，遣人走間道焚河橋，以絕西援」。⁷⁸ 根據這條史料，說宋軍所焚的是講珠橋是沒有問題的，可是關鍵的是講珠城是否在大夏河上，卻沒有進一步的證據。如果說阿里骨所發的「河北兵」，「由講珠城橋渡河」而進一步「圍河州」的「河」是指黃河的話，也和其他史料沒有矛盾。

⁷³ 《長編》卷二五二，頁6179。

⁷⁴ 同上注，卷二六七，頁6547。中華版標點本將「麥熟」二字加專名號，疑誤。考文義應為八月麥熟，引起對方抄掠，「麥熟」二字非部落名，與「宗哥」以下宜加逗號分清。

⁷⁵ 鈴木隆一：〈青唐をめぐる交通路〉，頁210附圖。

⁷⁶ 祝啟源：《峭廝囉——宋代藏族政權》，第四章第二節注11，頁141-42。

⁷⁷ Tsang Shui Lung, "War and Peace in Northern Sung China: Violence and Strategy in Flux" (Ph.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1997), p. 462.

⁷⁸ 《長編》卷四〇四，頁9841。《宋史》和《東都事略》兩〈姚兕傳〉的記載也略同。

此外，如果將講珠城的方位判定於大夏河上，我們就不那麼容易理解它在戰略上的重要性了。比如元祐二年种誼擒鬼章後，議者主張佔據講珠，控扼形勝。蘇軾反駁，說若論戰略上的重要性，由講珠而西到盛唐時的安西，都可以說是戰略要地，但卻懷疑能否一一攻取。⁷⁹可是按照蘇軾的話，如果講珠所控扼的不是黃河，而只是大夏河上一個渡口，豈能與安西相提並論？元符二年，种諤的兒子、知河州种朴，曾對洮西形勢作了分析，也認為：

河南一公、講珠等六寨正為河州門戶衝要，根本之地，儲積糧糗、蓄養土馬，其勢重則足以彈壓河北新附部族，稍有警急，自相援救，使生羌束手受制，政在于此。所有河南新復六寨，委是合置蕃兵一將，總領將官二員，正將一公、副將講珠。⁸⁰

從這個奏章中可見他對一公城等六寨地區之重視。一公城曾經是唃廝囉早期活動的地點，种朴謀求強化該地的控制，是有一定戰略眼光的。講珠被認為是其次重要的地方。這六個寨都在黃河南岸，「其勢重則足以彈壓河北新附部族」，若位於大夏河上，則不容易達到這個戰略目的。這個問題到現在還未有定論，不過兩個說法比較起來，我覺得大部分宋代的文字史料仍然傾向黃河說。正由於六逋宗是到達講珠之前的一個點，而講珠又是津樑要道，當宋軍得到講珠之後，六逋宗的重要性可能遭受掩蓋。

總之，如果認定《宋史·李浩傳》的合龍嶺即洮州合龍山，那麼就必須進而承認六逋宗是一個比較大的地理概念——「六逋宗左右三谷」的得失會對合龍嶺方向的戰況構成影響，而六逋宗城距東北方向的河州，及似乎是正西或西北方向的講珠城都只有一天路程。但正由於講珠的位置尚無定論，六逋宗的方位仍帶有一定模糊性。

然而對於六逋宗在地理上的模糊性及戰役沒有統一命名，我們不把它說成是純然的地理因素，而主要是和戰略文化的取向有關。古代所謂「征討」，帶有很鮮明的政治目的，把焦點放在擒斬敵軍首領和奪取政治性的城市上，而不一定在純粹軍事目標的達成，比如殲滅敵軍的戰略資源上。遠的不說，即以郭逵在富良江大破交趾，但因為沒法渡河攻取其首都，立即蒙受批評；王韶還未取得洮、河二州，朝廷卻已將熙、河、洮、岷建為一路。舊黨每每斥這種行為是好大喜功，而從客觀的角度看，也似乎太重視作戰結果的政治含義。六逋宗之役殺敵萬計，且擒斬冷雞朴，成果不少，可是鬼章「購之不能得」，而六逋宗城也不是故唐州、縣級的行政單位，相對上也就降低了值得史臣大書特書的元素。結果，我們在史書上看到的六逋宗戰役的標識，是擒斬冷雞朴一事，而戰場的方位反而不甚了了。

⁷⁹ 蘇軾(1037-1101)：《蘇東坡全集》(臺北：世界書局，1969年)，卷四，頁442。

⁸⁰ 《長編》卷五一七，頁12306。种朴戰死在己未日，此奏在辛酉日由樞密院上言中見。

另外，當時南中國的緊張局勢也可能分散了史家的注意力。自1050年代宋與交趾邊界即呈現緊張狀態，衝突斷斷續續地發生。和宋太宗在位時中越衝突主要起因於名分問題，也牽涉及交趾的繼承糾紛不同，1050–1070年代的危機主要是邊界衝突和人口掠奪而引起的。伴隨著儂智高廣源政權的興滅，宋人認識到傳統以來的羈縻政策過分被動，不能有效地防止部族之間的衝突和互相兼併，令強權得以在中越的夾縫中滋生。可是宋與交趾之間的緩衝一旦消失，便激化了關於廣源和甲峒誰屬的爭議，從前大概一直斷續地發生的人口被掠問題也矚目了起來。到熙寧七年左右，雙方都在大修邊備。一直主張積極拓邊的蕭注(1013–1073)，這時反而提醒宋神宗小心從事，理由是交趾的戰備狀態已超過了宋人。⁸¹事實上，蕭注的繼任者陸誥、沈起(1088卒)、劉彝(十一世紀下半)等都大事練兵，後者甚至斷絕貿易，製造軍用船隻，以備進取。⁸²這些帶有挑釁性的邊備招來交趾方面更強烈的反應。熙寧九年，交趾攻陷廣西帥府邕州，衝突昇級為戰爭，令王安石大為焦慮。⁸³宋神宗任命郭逵等統兵反擊，先後發生廣源和富良江兩次會戰，宋軍號稱收復所有失地，但由於付出較大傷亡，又未能攻佔交趾首府，引起舊黨大肆抨擊。⁸⁴是役動員近半年，遠征路途遙遠，且廣西帥府一度失守，事態遠較熙河嚴重，相比之下，也有可能令同時進行的六逋宗之役為之失色。

結 論

六逋宗之役發生在熙寧十年，是宦官李憲措置熙河邊事的主戰役。經此一役，宋軍大致上穩定了熙河路南部洮、岷一帶的統治，而唃廝囉王朝與宋廷的關係也由對抗重新傾向和好，為元豐靈夏之役的軍事合作打下基礎。這場戰役在傳統史料中有很多零星片段可尋，而趙起《种太尉傳》則提供了比較完整的記載，足見其價值之一斑。

以六逋宗戰役為例，可以初步說明傳統史料中的軍事行動，其成效或結果是透過四個標識來被理解和消化吸收的：

首先，將帥是否一位值得大書特書的人，是很重要的標識。李憲和种諤都是很有才幹的人，可是李憲以宦者帥熙河，种諤「開邊生事」，都很有爭論性。這些人的戰

⁸¹ 《長編》卷一九〇，頁4593；卷二四〇，頁5865；卷二四二，頁5904；《宋會要》蕃夷四，頁7716。

⁸² 《長編》卷二〇三，頁4922–23；卷二四二，頁5904；卷二四四，頁5933；卷二七一，頁6639。

⁸³ 《宋會要》職官七八，頁4187；《涑水記聞》卷十六，頁320；《長編》卷二七一，頁6684。

⁸⁴ 《長編》卷二八〇，頁68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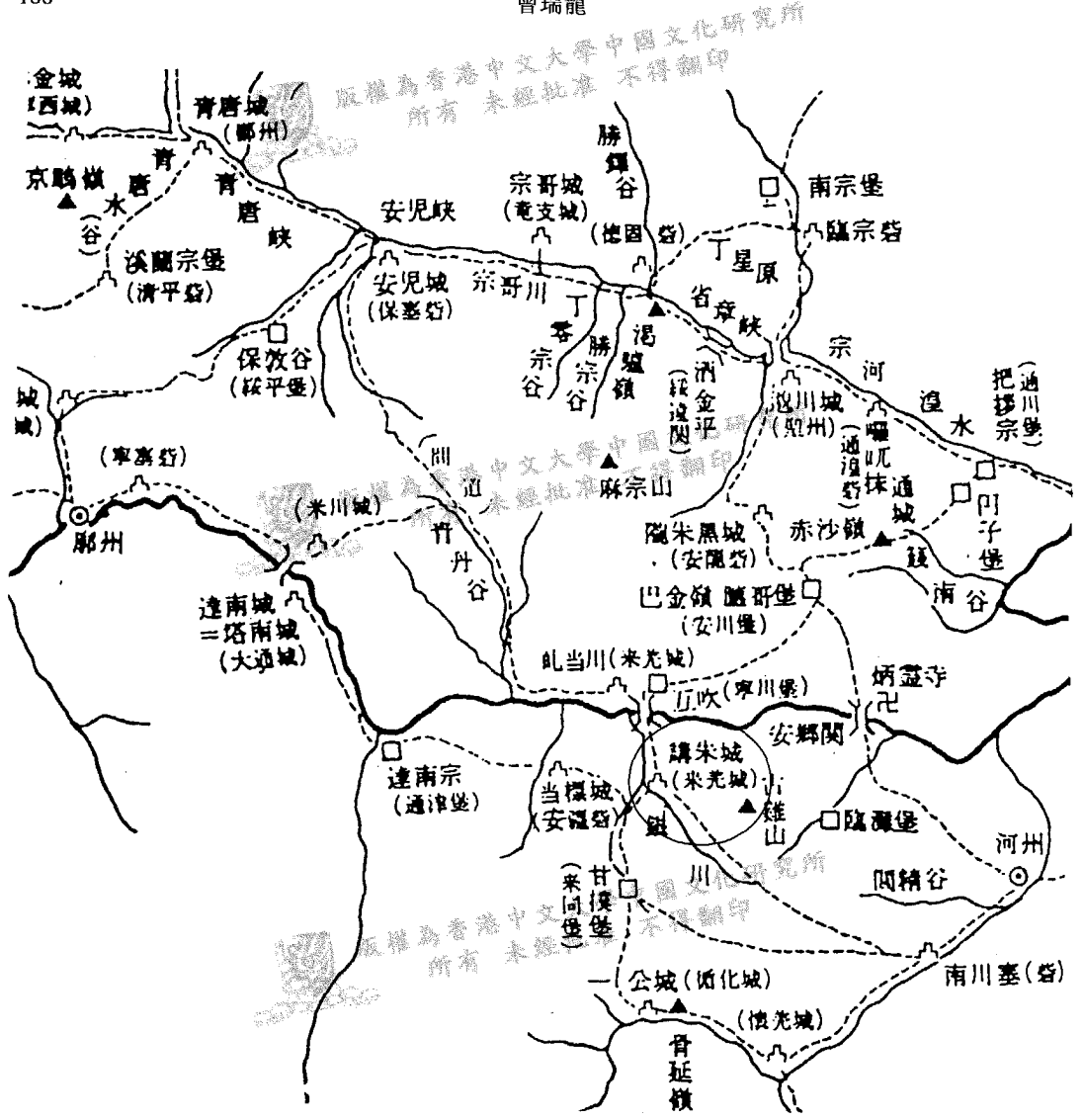
功，有可能被低調處理，或記載上發生較大歧異。《种太尉傳》有幸流傳到今天，實在是很難得的事情。

其次，作戰目標是否一個政治軍事性的城鎮，也是很重要的標識。標識的模糊，可能影響到戰役命名不一而產生記載上的混亂。和洮州不一樣，六逋宗城不是故唐州縣，相對上也就降低了值得史臣大書特書的元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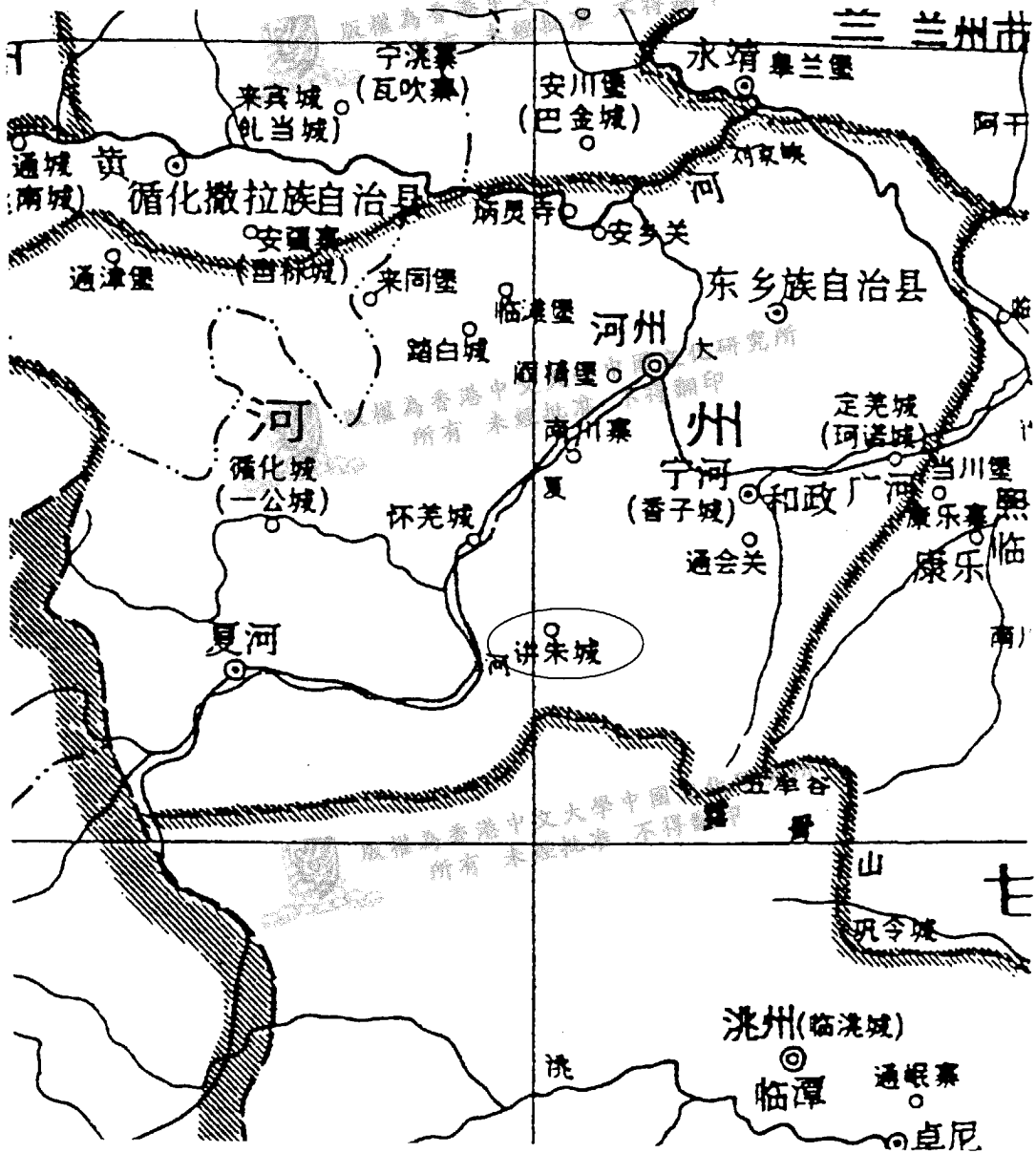
能否擒斬「敵酋」，可算做第三個重要的標識。殲滅了敵軍首腦，才算完成戰爭的政治目的。所有本文引出論證六逋宗戰役的史料，幾乎都有擒或斬冷雞朴的字樣。冷雞朴是被斬、被擒，還是先擒後斬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據此可以確定那是關於同一場戰役的史料。

最後一個重要標識是斬首的數目。我們知道這些斬首數字可能誇大，甚至有可能諱敗為功。懷疑報稱殺敵的數量與事實上的差距，其實是戰爭史家的天職，不過也無須視這些不可盡信的數字完全是弄虛作假所造成。由於數字本身無法識別戰功的真假，卻可以顯示戰功的大小，如果從這些數字的標識功能來看，斬一萬級的勝仗，戰果大於斬八百級的，其傳遞訊息的作用已經達到。至於打勝仗所損失的兵力，則常常略過不提，也未必盡由於刻意曲筆。不同來源的數字看去愈一致，標識的功能愈顯。六逋宗之役的斬獲，在諸將本傳中並非都有記載，但現存記載之間沒有很大矛盾，反映了戰果集中在种諤、李浩兩軍的情況。

這四個標識的認定，體現了意識形態和社會規範對戰略行為的制約；而透過這四個標識，現實層面的「戰果」得以上昇到象徵和理念層面，成為「戰功」。六逋宗戰役可以算是宋與吐蕃唃廝囉王朝的幾場決戰之一，然而它頭兩個標識比較模糊，只有後兩個比較清楚。也是主要憑著後兩個標識，我們才能從雜亂的史料中把它部分地重整出來。當然，以上的討論還停留在初探的地步，不具普遍意義，然而筆者深信隨著軍事史研究的深入展開，戰爭史料的詮釋將會更有系統和規範，完全是可以預見的事情。



附圖一 講珠城之方位：黃河說(採自鈴木隆一：〈青唐をめぐる交通路〉)。



附圖二 講珠城之方位：大夏河說(採自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上海：地圖出版社，1982年]，第六冊，頁20)

Zhao Qi's *Zhong Taiwei Zhuan*: The Record about the Battle of Liubuzong

(A Summary)

Shui-lung Tsang

On the Song colonization process of the Xihe region, the battle of Liubuzong in 1077 marked a crucial transition. The defeat of the Tibetans Gusiluo regime saw an end of armed resistance toward the Song effort in establishing local control over the Tao River Valley until 1087. The battle was also a turning point of the Tibetan relation to the Song from confrontation to cooperation. On this battle there are scattered records in official historical sources, including a name list of promotion of the Song officers after the victory and sprinkled accounts in the biographies of the generals. However, none of these sources indicate how the battle was fought in 1077. This paper utilizes a private source *Zhong Taiwei zhuan*, a biography of General Zhong E written approximately in the early twelfth century. It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account on the occurrence of the Liubuzong campaign and strongly corroborates the scattered records in the official histories.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strategic culture, this paper also analyses why most of the historians during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y tended to downplay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battle.

